

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的文化根基

韩 震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全面解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两个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实践过程,这一过程确证了马克思主义行,确证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两个结合”行得通,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都有文化的原因,涉及价值观的契合性、世界观方法论的共同性、语言话语方式的近似性以及前理解解构的生成性。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将引领中华文化走向更加灿烂的未来。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两个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韩 震,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全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行,就在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一定的意义上,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过程有非常深厚的文化根基。

一、“两个结合”更全面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这段话充分阐明了,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是我们党从成立走向成功的根本原因:有了这种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前行的路就可以不忘初心、牢记宗旨使命,从而有坚不可摧的信仰、有不可动摇的必胜信念;有了这种科学理论指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6 页。

导,我们奋斗的路上就可以遵循历史变化的规律、避免许多的盲目性,从而既尊重实际又发挥革命的能动性,让中国人民形成了清醒的历史自觉并焕发了强烈的主动精神,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个判断,以实践的观点非常完整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國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进程之间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本身就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升华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中的理论,更不是用来记诵的教条。实际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1],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现实历史运动中实践的“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

正是在艰苦绝卓的历史实践中,甚至在经历某些让人感到切肤之痛的碰壁、失误与教训后,我们才逐渐认识到,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在实践的路上,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场观点方法,才能真正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发展和实践拓展提出的重大问题;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理论和实践相互促进,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中国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马克思对我国古代农民起义提出的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革命口号有过敏锐的观察。他说,‘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2]这段话明确且深刻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运用和发展的文化根基。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沃土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就在于它是行动的指南。作为行动的指南,它必须与行动中的历史实际与文化背景相关照。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3]。显然,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植根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沃土之中,让马克思主义这棵大树有了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根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拓展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视野,提升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境界;另一方面,中国也给予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落地实践的广阔社会空间,从而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提供了不竭的思想文化动力。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在价值取向上高度契合,从而让中国人民能够真切地理解并且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念和价值主张。中华传统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而西方崛起是工业革命的结果。中国在农业社会时期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但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落伍了。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或者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是要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赶上世界历史的潮流。正像欧洲的农业可以赶上西亚的农业,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地区也可以赶超西方的工业化进程。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在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时有过许多的探索,不仅有人提出模仿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全盘西化”论,也曾经有过袁世凯、张勋所上演的“复古”闹剧。但是,这些尝试都不能实现中国既维护民族独立又追求国家强盛的双重目标。就中国当

[1][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6页,第17页。

[2]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

时的形势,有西方学者指出:“外国人通过一系列战争迫使中国向贸易、投资和传教活动开放国门。到了19世纪末,中国领导人得出结论:经济上的落后是造成中国军事力量羸弱的首要原因。如何在保持国家独立的同时实现现代化,使国家富强,成为中国政治中的首要问题。”^[1]为什么不能走文化保守主义的道路?因为那个道路不能启蒙,无法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因其不能现代化且无法使中国强盛起来,所以也无法让中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为什么不能走“全盘西化”的路?因为不仅存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问题,而且西方列强也不允许中国通过走它们的路变得与它们一样强大。在此,关键的问题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道路的价值观主张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去甚远。中国主张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倡导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以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为价值原则,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是靠殖民掠夺而兴起的,企图以霸权支配整个世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尊重其他民族的特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存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2]问题是,当资本主义把其他民族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时,它并非要让非西方变得与西方一样富强,而是主张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漠视其他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文化权利,让非西方变成西方的附庸,即“它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让中国人民找到了价值观相契合的“知音”。

近代中国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启蒙,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二是救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方面,中国要进行现代性启蒙,走出封建主义的落后境地,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能够符合中国人民的期望,因为马克思主义承认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先进性(资本主义大大地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中国要救亡图存,维护民族独立,而批判资本主义剥削本质和揭露殖民主义残酷掠夺的马克思主义,也能够给予中国人民一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旗帜,马克思主义主张一切受压迫民族都应该得到解放,这让中国人民得到了极大的精神鼓舞。李大钊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表明,他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他指出,“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倘能循此途辙,以达于民族独立的境界,那么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4]。陈独秀在《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一文中,不仅将十月革命视为“工农解放民族解放”“双管齐下”的革命,而且认为“十月革命在民族解放运动上比工农解放运动上更为成功”^[5]。由此可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是因为十月革命让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道路的希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进行不懈的奋斗。党的奋斗推动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民所选择,社会主义为中国历史所选择。也正因为如此,“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判断。

[1]安德·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柯雄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页,第36页。

[4]《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6—517页。

[5]《陈独秀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8页。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世界观、方法论上有共同点,从而能够让中国人民接受并且信仰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1]。这些观念不仅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而且也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精神上高度相通。譬如,考古发现证明了,“中国始终秉持一种整体性、连续性的宇宙观”,“这种整体性宇宙观,本身就包含了整体思维、天人合一的文化基因”,这种宇宙观“是一种将天地宇宙、人类万物统一起来的强调普遍联系的整体性宇宙观,是一种动态而非静止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在中国史前文化中便已存在,并逐渐发展为“《周易》《道德经》所代表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适时而为的世界观,阴阳互补、对立统一、变动不居的辩证思维”^[2]。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世界观显然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并且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再有,在世界历史上,中华文明主流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持一种理性世俗的立场,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强调经世致用和实用理性,这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观点,以及强调以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改造世界、在现实社会追求美好社会的理想有共同之处。

在社会历史观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也有许多相通之处。中国在处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关系上,自古就有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理念,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自由人联合体的追求在社会历史观上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却在东方结出硕果,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国文化传统有相通之处有关。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理想迟迟不能落地,不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成为现实的实践,这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行”,而更多是因为资本的逻辑遮蔽了真理的逻辑。与此同时,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传统的盛行,显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譬如,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进程,经济安全、气候、环境等问题已经把全人类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基于此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图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可是,美国则这样理解,它反而将人类世界看作你输我赢的竞技场。为了回应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致辞,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麦克马斯特和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科恩,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世界不是一种‘全球共同体’,而是一个由各个国家、非政府行为主体和企业为获得优势而在其中参与竞争的舞台。”^[3]可见,中国人因为自身的文化传统,在国际上更多看到的是合作共赢,而美国人因其文化传统和霸权利益更多看到的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关系。美国之所以不能理解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就在于他们的文化传统。西欧文化深受海盗文化的浸染,因而西方世界广泛持有国强必霸的逻辑,美国继承发展了这种文化逻辑,还基于这种逻辑和文化心理看待中国。如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就言辞凿凿地指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所有其他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页。

[2]韩建业:《从考古发现看8000年以来早期中国的文化基因》,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从考古看中国》,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98—101页。

[3]转引自罗斯义:《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中国乃至全人类都至关重要》,《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做法。”^[1]但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的确有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地方,这些地方也正是中国人民所珍视的,同时也会给人类文明带来更佳的参照和选择。随着世界交往的增加,人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会越来越真切。法国国际问题专家布鲁诺·吉格就指出:“中国是一个和平发展的大国,对自身的文化特质感到自豪,遵守国际规则,提倡互相尊重……如果所有大国都能像中国一样,世界将更和平。”^[2]我们希望,文明之间可以交流互鉴——正像源自西欧的马克思主义激活并丰富了中国文化,中国的文明新形态也能够为人类的福祉做出贡献。

再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理论同唯物辩证法在话语体系、语言风格上近似,从而让中国人民容易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促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的广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上都倾向于把世界看作一个普遍联系、运动变化的整体,因此,唯物辩证法思想很容易在中国找到理论上的知音。正因此,当其他从欧美舶来的许多哲学体系以中文表达显得佶屈聱牙、晦涩难懂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却在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获得了生动的中国语言表达,特别是诸如“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矛盾”“知行合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人民至上”“底线思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一系列丰富多彩、脍炙人口的中国话语,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表达得淋漓尽致,并且很快为中国人民所理解、赞同和运用。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让这种理论与中国共产党人有了共同的语言,而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华话语表达又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融入了中国人民的精神追求之中。

语言不是小事,语言是人类有意义生活的载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的社会关系往往是靠语言构建起来的。如果没有合适的语言,就无法表达一定的思想;没有合适的话语体系,也就无法阐明一定的理论体系。语言表达得准确且容易被理解,理论才能被群众掌握;唯有被群众掌握了,理论才能发挥其批判的力量。这就是《易经》指出的:“言行,君子之枢机。……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3]这就是说,话说得合适,文字表达的思想观念正确,无论身边还是远处的人都能够理解并认可;而话说得不合适,文字表达的思想观念不正确,身边和远处的人可能会不认可或者干脆反对。由此可见,言语行为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是有关人们能否正确理解和接受某种理论的关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拥护和发展,与中国思想文化话语能够比较好地表达马克思主义是有一定关系的。

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让先进的科学理论获得了最基础、最直接、最具生成性的“前理解结构”,使中国人民得以在实践中运用并且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们在理解理论之前不是一个白板,而是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理论观念和理解力,这种理论观念和理解力就构成理理解的前理解结构。理论接受者不是被动地接受理论,而是创造性地理解并阐释、应用和发展理论。一方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回到古典的中华文明,而应该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淬炼,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超越当下的新文明观念;另一方面,理论只有被群众所理解才能成为现实的批判力量,而作为理论接受主体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且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这个民族有着独特的前理解结构。任何理解都基于某种前理解结构,否则理解就不可能实现。

[1]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2]徐永春、唐霁、孙鑫晶:《中国发展模式避免西方“老路”缺陷——法国政学界人士谈中国式现代化》,《参考消息》2022年11月24日。

[3]《周易》,杨天才译注,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19页。

作为马克思主义接受主体的中华民族,必定是在自己已经具备的文化理解结构基础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这种理解结构中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才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才能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根据已经被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也只有如此,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始终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保持其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显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证明以下几点:第一,历史并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或遗留事物的博物馆,历史特别是文化传统仍然活在现实的社会运动之中。就此,匈牙利裔美国学者阿格尼斯·赫勒认为,在任何伟大的文明中,“历史回忆和对往昔记忆的珍视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历史记忆保存在故事、传说和符号中,在这里,英勇的事件、伟大的竞赛和特别的磨难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历史记忆讲述行动的故事,讲述各种制度的起源和它们的消亡。过去制度的内在结构不是保存在历史意识的深处,而是通过男人和女人的行为保存下来”^[1]。这就是说,文化传统就存在于现在人们的行为之中,人们的行为就延续着文化传统。第二,历史传统一旦与时代问题和理论思考相结合,就能够产生出新的思想和价值。实际上,综合东西方文明是中华文化的未来,在这一点上,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以及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都已提出过^[2]。第三,文化传统越是具有历史的深度,就越是具有文化复兴的活力。由一些外国学者对美国与东亚竞争的感叹,我们更能够理解历史文化根基的重要性。霍夫亨兹与柯德尔在《东亚之锋》中指出,作为在经济发展上与美国是潜在对手的东亚,“它们的历史之根如此深邃、如此古老,以至于忽视它们今天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实在是太愚蠢了”^[3]。中国人民正是基于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才较好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将马克思主义深深纳入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之中。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超越理论的词句,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4]。

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将引领中华文化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前一个过程夯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基础,而后一个过程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根基。从文化发展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能够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而且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这给了我们信心与力量,让我们坚信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将引领中华文化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首先,今后我们应该把有深厚历史根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融通,使二者在

[1]阿格尼斯·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5页。

[2]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冀建中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第71—72页。

[3]小R.霍夫亨兹、K. E.柯德尔:《东亚之锋》,黎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7—18页。

结合中交相辉映。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1]。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成果,让我们更加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信心百倍地迈向未来。

其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我们应该让具有丰富内涵和创造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事关能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事关能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要求我们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让这一制度嵌入中华文化传统,成为中国文化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制度性保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要求我们一如既往地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创造有利于文化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要求我们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发展导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要求我们坚持不懈地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在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经历百年变局过程中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总之,我们必须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心,育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形象。

最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我们将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就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只有坚守本民族文化的立场,才能在百舸争流的大势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就必须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有了体现文化精髓的标识,才能展现中华文化的特色和魅力,才能展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活力;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就必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以自主知识体系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就必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不断深化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获得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责任编辑:洪 峰]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8 页。